

蚀日者

江建忠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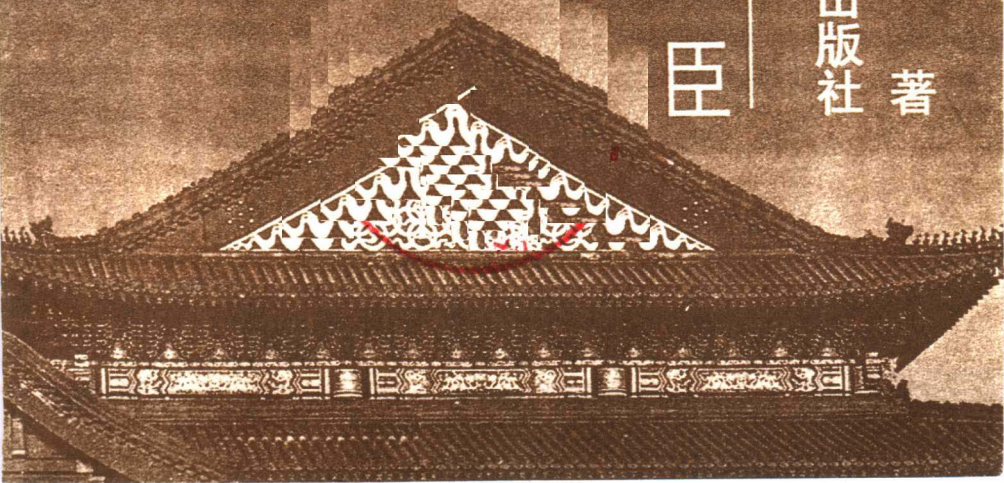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的权臣



蚀日者

江建忠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代的权臣



蚀日者

中国古代的权臣

江建忠 著

责任编辑 王立翔

封面设计 王伟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印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本 850×1156 1/32

字数 135,000

印张 6.25

版次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插页 4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3,000

ISBN 7-5325-2029-3/K·221

定价: 12.00 元

前 言

权臣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现象。

零星散见于某些朝代的作为个体存在的被称之为权臣的人物，从来就没有构成过一个社会群体，甚至连社会层面都称不上。但是，这种特殊历史现象，千百年来不知惊扰过多少英主贤臣、贞人志士的梦魂，留给史家论者多少迷惘、困惑。

最早出现权臣这个词汇，是在《晏子》这部先秦的著作中。而后，生活在权臣人物频繁出现的六朝时代的大史学家范曄，在他所撰写的史学巨著《后汉书》中，试图对权臣作出政治漫画式的描述：“权臣放纵，矫称诏制。”这幅权臣图像，绝对不是全面的，但却也呈现了某些权臣行为的真实。只不过正统的封建史家，出于维护圣君贤主的忠肝义胆，抑制不住对任何有损于帝王家的行为的愤慨，对堂堂正正的皇家史事里出现的“非常人”所行的“非常事”的认识，打从一开始就不自觉

地走入误区。

作为帝王们学习统治术的教科书——《资治通鉴》，对权臣的人与事，乃至一言一行，都不厌其烦地仔细搜罗、纪录，再配上元人胡三省的解释，把对权臣的警惕、鞭挞，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对帝王们的佐治之勋，真可谓是莫此大焉！对愿意冷静地研究、评论历史上权臣现象的后人说来，倒也同样功不可没！

到了现代，人们对权臣现象的认识，逐渐摆脱正统史家的偏执的影响，更多地注视历史人物行为的得失和相互间的类比，普遍对权臣趋于宽容。同时，人们发现，可以归入权臣行列的历史人物，似乎变得多了起来。这恐怕要归咎于过分地专注于“权”这个特定商标的缘故。于是乎，妇孺皆知的贤相诸葛亮首先戴上权臣的帽子，挤入了曹操行列；明朝那位神宗皇帝的老师、内阁首席宰辅张居正，也推推搡搡地被拉入权臣的席位。此外，正史中形形色色的佞臣、奸臣，只要“权势薰天”、残害忠良、祸国殃民，都一一标上权臣的徽记。人们观察权臣现象的视野陡然变得空前开阔起来。

看来中国古代史上权臣现象这一课题，有待更多对此感兴趣的史学工作者加以深入研究，才能逐步廓清。而这本小册子只想把问题提出来，并试图先把“狭义的权臣”从广义的权臣中“界定”出来；用比较多的史实，通俗地说明权臣现象不是无限制地反复出现，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遇不可求地介入历史，以求清理出权臣的生成、发展、最终归于消泯的轨迹。如果真能达到这个微末的目的，那将是笔者的莫大荣幸。

作者

于1995年深秋

目 录

前言	1
可遇不可求的权臣	1
权臣的徽记	5
绝伦的高位	5
无上的军权	9
成功的废立	12
超俗的使命	19
登上权臣地位的阶梯	25
朝官大臣的非常扩张	26
外镇边将的夤缘入据	32
权臣的左右手	35
“同气相求”的谋士	36

难以出头的武将	39
过分的热情	43
神圣的光环	47
金滕前的周公	48
执政后的霍光	50
死而后已的诸葛亮	54
王夷甫的“为门户计”	56
偏见——沉重的十字架	62
“宁我负人”的曹操	63
“遗臭万年”的桓温	67
诱人的歧途	74
王莽所开的先河	75
征西将军墓志	84
司马昭之心	94
勉强跨过一步的王大将军	105
畏缩不前的运甓公	115
棋差一着的庾氏兄弟	125
求九锡的疑案	136
祁连池上的乐声	149
姑且立一个皇帝	160
大诛杀而后定的隋文帝	174
再也没有权臣	184
秦皇汉武的隐忧	184
伟大的唐宗宋祖	188
皇权永远会迷失	194

斗大江山，经几度，兴亡事业。
瞥眼处，英雄成败，底须重说。
——明·吴易

可遇不可求的权臣

世上有些事物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权臣就是这样。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里，什么样的名位都可以通过追求而得到，什么样的名位也都有人追求过：

战国时的苏秦，一心追求“卿相之尊”，锥股血踵，发愤揣摩太公《阴符》，终于身佩六国相印；吕不韦以阳翟商贾的身份，为追求“无数”倍之利，不惜以千金、美女，押宝在异国人质的身上，终于取得富可敌国、位极人臣的丞相高位；书生班超，渴望“飞而食肉”、万里封侯，不甘心于刀笔吏的碌碌生涯，投笔从戎，历尽艰辛，遂就了封侯拜爵的心愿；一介寒士吕蒙正，通过科举，在仕途上直攀到参知政事的名位。^①

甚至连“皇帝”这样的神圣至尊之位，也有人追求，居然也屡屡有人追求成功。秦始皇出巡，亡命江湖的落魄贵胄项羽和狼为亭长的刘邦，分别都为皇帝的至尊荣耀所吸引。前者说“彼可取而代之”，后者则认为“大丈夫正应该如此”。后来一个成为大汉开国君主，一个成为一度号令天下的“西楚霸王”。

至于一心觊觎皇位，搏命于“逐鹿中原”的皇位游戏者，更是大有人在。

汉朝初建，大汉高祖皇帝刘邦的宝座尚未坐热，功臣猛将一个接一个地“叛乱”。贵为淮南王，拥有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四个大郡的英布，原是个黥徒（因犯法而刺字面上，去服苦役的刑徒）出身的“群盗”，当功劳和他相埒的彭越、韩信相继被诛杀之后，也据地造反了。刘邦亲自带兵前去镇压。两军阵前，刘邦对英布说：“你又何苦要造反呢？”英布干脆地回答说：“想当皇帝！”^②

英布最后身败国灭，没有当成皇帝。可是，后世的王莽、孙权、刘备、刘渊、石勒、苻坚、刘裕、萧衍、杨坚、李渊、赵匡胤、朱元璋等一个个野心勃勃的乱世英雄，无不是竭尽心智，刀光剑影地“逐鹿”一番之后，如愿以偿地登上皇位的。

还有一种追求。

帝王将相、大小官吏，出自某种原因而策励自己，孜孜努力要成为名臣、良将，乃至贤明天子：诸葛亮躬耕陇亩，自比管仲、乐毅，辅佐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名垂千古的贤相；土豪周处，横行乡里，名列“三害”，后来折节励志，成为一个刚正一时的御史中丞，最后堂堂正正地殁于王事；^③唐太宗李世民，靠弑兄逼父取得帝位，但又强抑私欲，纳谏从善，终

于成为明君英主的典型；大名鼎鼎的文天祥，独力支撑南宋半壁江山，不惜喋血柴市，用一片丹心证明自己是坚贞不贰的忠臣。这些事例，说明存在着这样一种追求，而且也是可以经过努力而实现的。

唯独权臣，历史上没有一个人物以此作为自己的追求目的。

不仅因为权臣这个词，在传统观念中并不是个褒义词，更重要的是，权臣实际上是一种微妙的历史选择，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特殊境界。这种名位，看来仿佛也可以一步一步攀登而至，但一旦接近了它，有时它会飘忽到一边去，教你把握不住，很有点“瞻之在前，忽焉其后”的意味。遇合者往往会感到，这里容不得半点退缩，也来不得半点超越，稍有失措，历史就匆匆地翻到另一页去了。

当历史的暗潮，有意无意把某个人物推向权臣这个特殊境界时，往往或出于本人思想意识的障碍，或出于某种政治力量的干扰，中途停滞下来了，这个人物就成不了权臣，而只会流为一般意义的大臣。或者虽然没有上述的那种障碍和干扰，而本人却过于热衷，同样不能在这个特殊的境界上定位，这个人物还是成不了权臣，也许就此成为某个王朝的开国英主。而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所要说的狭义上的权臣。

然而，历史上确实有过那么一批人物，他与某种历史机缘相契合了，定位在这种特殊的境界。尽管有时甚至是违背了本人的意愿，但是历史的力量，使他们无可奈何地成为这种境界的陈列品，在历史的巨大橱窗中，让古往今来的人们，这样或那样地议论着。这就为本书提供了向读者阐述自己看法的机会。

注 释

- ①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以吕蒙正为参知政事。宋制参知政事为执政,相当于副相,一般都由名闻天下的大臣充任。
- ② 《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
- ③ 《晋书》卷五十八《周处传》:“处自知为人所恶,乃慨然有改励之志,谓父老曰:‘今时和岁事,何苦而不乐耶?’父老叹曰:‘三害未除,何乐之有!’处曰:‘何谓也?’答曰:‘南山白额猛兽,长桥下蛟,并子为三矣。’”

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

——清·王夫之

权臣的徽记

一般地说，“权侔人主”的大臣比比皆是。打开一部二十四史，哪一个朝代都有那么几个亹亹逼人的大臣，玩弄权柄，操擅朝政，风风雨雨地闹得朝野怨望，七庙危殆。但是，仔细分析之下，这些权倾朝野的大臣，不一定是上述那种定位于微妙特殊境界的权臣。狭义上的权臣，应该有其独特的徽记。

绝伦的高位

专制主义下的皇帝，总自认为“朕即国家”，拥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但这是后来的事，在统一的封建主义国家出现的初期并不如此。丞相作为“天子副贰”，在当时的政治体

制中，对皇帝既有作为臣下的隶属性；又有作为天子助手的实权。丞相总揆百官，下理万民，拥有施行行政权力的府署，足以抗衡、抑制君主的行动。这是与皇帝的本意迥然相违的。

第一个把皇帝的称号加在自己身上的秦始皇帝，也是第一个感觉到丞相权位对自己障碍和威胁的人。

这个把六国故宫都仿制在咸阳，把万余名美女充陈在后宫，一心要享尽天下乐事的独夫，竟然“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一天要披阅一百斤重的竹简文书。很难想象，一个享乐至上的秦始皇帝会把如此烦重的“超级劳役”视作自己的一大享受；古往今来的史家们以“勤于国家”来解释，也扞格难通。其实很简单，这仅是一个把九州六合视作一家私产，想使它传之万世的皇帝，对丞相猜忌防范心理的直接反映。只不过，这位“千古一帝”头脑简单，手法笨拙，才这样蛮干。

另一位常与秦始皇一起被人相提并论的汉武帝，就高明得多了。这位史称“多欲”，而又雄心勃勃的汉帝，一登帝位，就被汉初那种所谓“屈君伸臣”的局面所困扰。这位信奉由朕一人进行专制统治的雄主，首先就以频繁罢相的手段，来显示自己的权威、削弱丞相的地位。接着又从外戚丞相田蚡手中，分得本来掌握在丞相手中的官吏任用权。

同时，这位敢作敢为的汉武帝，大量征任属于皇帝近侍的郎官和大夫，逐渐形成与原由丞相系统政务官为核心的“朝廷”有别的“内廷”。用“加官”的方式，让原本品位卑小的郎官、大夫等内朝官，再加上“侍中”、“给事中”等头衔，得以在皇帝身边参与国事机要。而得不到加官的外朝官，则被排斥在机要之外，变成单纯的奉诏行事的行政官员。

同时，汉武帝又把原来属于少府署，处理文书的尚书，通过加官的形式，从朝廷公卿的管辖下分离出来，变成皇帝与丞相的中介。臣下的奏章，先通过尚书进呈皇帝，然后又再由尚书下达给丞相。而皇帝对一些重要政事，往往直接先与尚书商量，乃至任其起草文书，使之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清要之职”。不久，尚书各曹，索性把外廷所管的民政、财政、人事、监察等具体事务接过来。各曹尚书由只管诏令文书的机构，变成实际处理政务的机构，后来就实质化地形成尚书台。^①至此，号称“天子副贰”的丞相之职形同虚设。甚至以种种借口，不经常设立了。

汉武帝又以亲信所担任的大将军，来接管丞相的兵权，并加上大司马的称号，使之位于丞相之上。

然而，任何办实事的机构，哪怕是由皇帝所亲近的内朝官所构成的尚书系统，总要与外朝发生联系，管事日久，总会形成自己的独立性见解，皇帝还是不能放心。所以汉武帝在位时，就出现了与尚书系统相平行的机构，那就是中书令为首的中书系统。不过其初还是参用宦官来担任的，东汉后就专用士人了。乍看起来，中书系统紧随尚书系统而出现，简直是叠床架屋，多此一举。但有谁能知晓雄主汉武帝的一番苦心呢！

总之，自汉武帝以来，尽管丞相的名号未曾取消，仍在行使其行政权，但实际上真正决定重大政事的，要末是以兵权为主导的大将军大司马；要末就是据有机要的尚书。有实权而有丞相称号的大臣，只有在非常时期或有特殊功业，才会偶而出现。 ✓

权臣，就往往出自据有这些名位的人物之中。

西汉第一号权臣霍光，即以贵戚身份入官充任郎官，当上奉车都尉光禄大夫，侍奉汉武帝二十年，取得极大的信任，最后以大司马大将军之职，成为汉武帝的顾命大臣，开始他那声誉可与周公、阿衡（伊尹）相比的权臣生涯的。

后来篡位而当上新朝皇帝的王莽，也是以外戚关系，从黄门侍郎进入内廷，也在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这些内廷要职上耽过。最后代叔父王根为大司马，从而走过一段权臣的道路。

被外戚何进招引入朝的董卓，重视兵权，迳自封为太尉，接着一下子成为“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相国。相国这个名号，在汉代无比隆高，自萧何之后，就没有人担任过。董卓暴兴暴灭。他依仗兵权，先行废立，再据相位，以专杀为务，草略民财，很快就被诛灭。他所得的相位，就是属于有绝对权威的那种。

著名的曹操，最后位至魏王。他刚挟得汉献帝这个末世天子时，也是以“录尚书事”兼大将军来开始其“令诸侯”的权臣生涯的。^②平定北方之后，又登丞相相位，同样“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但始终没有加上相国这个特殊名号。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爵为王，出警入蹕，用天子的旌旗，戴着和天子一样的十二旒冕，妻称后，子称太子，离皇帝仅是一步之差了。

北魏末年，尔朱荣旧部高欢在混乱的政局中崛起，以武力军功取得“东道大行台”的要职和渤海王的称号，不久又取得大丞相的名号。后来，在与尔朱氏的政治纷争中，脱离北魏中央，在东部另立朝廷，成为东魏政权的缔造者。但是，这位东魏政权的真正主宰，不图帝位，不羨王爵，甚至连大丞相之位

也索性辞去了。这种只讲实力,不讲名位的情况,在众多的权臣中是不多见的。

南朝四代,所有的权臣都差不多以一个模式进阶:先由军功成为能开府的高品将军,然后以“录尚书事”把握政事,最后都进位到相国。

北周权臣杨坚,主要不是靠军功进位,而是在诡秘的政治活动中步步晋升。在他当上国丈之前,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柱国,兼一个州的总管。周宣帝时,才任这位国丈为大柱国、大司马,还是不能真正地控制朝政。大定一年(580),北周中枢发生变故,周宣帝不明不白地死去。杨坚的党羽内史上大夫郑泽和御正大夫刘昉假传圣旨,才把他弄到执政的位置上去,成为大丞相,总领百官。到杨坚摆脱权臣的地位,一变而为隋朝开国皇帝的当口,北周给他的封号是:假黄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王。

无上的军权

军事力量是权力转移的催生婆。

激烈的权力转移固然是这样:

汉初刘氏皇族和功臣联合诛灭把持政权的诸吕,最关键的一着,就是周勃用“拥刘氏者左袒”的方式,掌握了当时京师地区的绝对军事力量北军;一代圣主李世民,从父兄手中夺过大唐政权,依仗的是玄武门前一场刀光剑影的殊死决战;以“节俭、平徭”而得到史家众口交誉的隋高祖文皇帝杨坚,则是以武力“大诛杀”而后得以建立他那短命的大隋王朝;以文定国的宋太祖赵匡胤,如果不是掌握了全国最精锐的禁军,恐怕难以在小小兵站陈桥驿“黄袍加身”;明燕王朱棣,罗致了燕北

精兵，才敢于发动“靖难之役”，血洗中原，然后得以把侄儿朱允炆的皇冠，戴到自己的头上。

至于异姓天下的更迭，更无不是“龙战九野”，弄得个白骨千里，才达到“与民更始”，换了个新世界的。

权臣之所以成为权臣，也有一个权力转移的过程。

这种权力的转移，一般地说总是相对地比较平和。尽管如此，军事力量依然是这种转移的根本因素。当权臣在向最高权位靠拢时，不管是自觉，抑是不自觉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取得，几乎是与权臣地位的完成是同步的。

带有外戚色彩的权臣，他们获得军权的方式最为平缓合法。

西汉的霍光和王莽，都是在权力上升的同时，被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堂堂正正地由一个根本不懂军事的人，掌握了全国最高军权。北周的杨坚，基本上也是如此，只是在最后一步，趁周宣帝驾崩之机，稍为搞了些小阴谋，才得到“都督内外诸军事”的权力，从而当了一阵子权臣。

其余的权臣，其军权的取得，也都是步步渐进，至少是在为国效命的名义下，一刀一枪地晋升，最后总揽全国军权的。

东汉末年，在农民起义的打击和牵制下，原地方上的军事力量消耗甚剧，相反，中央在黄巾起义的刺激下，却兴起一股黩武的浪潮。被史家说得一无所能的汉灵帝刘宏是这场黩武浪潮中的活跃分子。他在这种尚武的气氛中，置立了西园八校尉，其中网罗了袁绍、曹操等英俊之士，由太监蹇硕为统领，又在城郊举行数万步兵骑兵相配合的军事操演，自己顶盔披甲，亲临检阅，一切搞得像模像样。^③名义上掌握军事指挥权的大将军何进，才智平庸，为了向宦官争权，不惜借重只有三